

青春梦启航 • Sailing with Youth Dreams

主编 牟德刚

守望星空

W A T C H E R S O F T H E S K Y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选介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Classics in the
Last Century*

吴翔之 李鹏 编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青春梦启航

守望星空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选介

吴翔之 李 鹏 编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守望星空：百年中国文学经典选介 / 吴翔之, 李鹏
编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 6

(青春梦启航/牟德刚主编)

ISBN 978-7-308-13307-4

I. ①守… II. ①吴…②李… III. ①中国文学—文
学欣赏—青年读物 IV. ①I20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2705 号

丛书出版说明

这套丛书是给在校大学生朋友们阅读的。

我曾经看过一个当代大学生阅读习惯方面的调查报告,其中有三个值得关注的结论:一是大学生们更喜欢阅读纸质书籍。虽然网络提供的电子书籍极其丰富,但是网络阅读具有跳跃性,有太多的链接,容易分心。二是除了不得不阅读的专业书籍,大学生们喜欢读内容“浅”一些的书籍。这个“浅”可以理解为通俗的、实用的或阅读起来不用“费脑子”的。因为现代信息社会提供的信息量太多,学生们没有“耐心”阅读专业之外的有深度的书籍。三是大学生们的自主阅读能力不强,看什么书有一种从众心理,往往会在寝室里共同阅读同一本书,这本书可以成一种谈资、一个话题,成为交流的桥梁。

根据大学生们的阅读特点,我想为他们编一套在寝室里可以一起阅读、一起交流的丛书。这套书能够满足同学们当下的知识需求,无须深刻或系统,却可以成为同学之间的谈资,并转化为有用的观念和知识,提升同学们的文明素养。

丛书的七个主题是作者们一起商讨的结果。多数作者都很年轻,在学校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思想价值观念和心态都很接近青年学生,又有各自的学术研究领域。如何写好各自的小册子,大家有着共同的理念: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并将其融进每一个章节;内容要简

练,只是反映学生们在校期间的知识需求;语言文字表达要尽量通俗化或口语化,使阅读不会成为负担。我们相信,这七个主题和各本书的写作风格会受到大学生们的欢迎。

这套丛书的写作和出版得到温州大学党委宣传部、人文社科处、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温州人经济研究中心和各学生工作部门的支持,得到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帮助,我们对此表示真诚的谢意。由于从选题到出版的时间比较仓促,作者的水平和精力有限,书中难免会有一些不妥之处,尚祈大学生朋友们谅解。

牟德刚

2014年3月

目 录

第一章

百年中国文学发展历程 / 001

第一节 文学的革命和革命中的文学
(1919—1949) / 001

第二节 “运动”中的文学和文学的不运动
(1949—1976) / 007

第三节 文学的自我救赎和文学的狂欢盛宴
(1976 年以来) / 011

第二章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选介 / 017

第一节 小说作品选介 / 017

第二节 诗歌作品选介 / 068

第三节 散文作品选介 / 072

第三章

温籍作家选介 / 082

第一节 温籍“老作家”掠影 / 082

第二节 温籍中生代作家群像 / 085

第三节 温籍新锐作家群像 / 089

参考文献 / 094

后 记 / 096

第一章 百年中国文学发展历程

第一节 文学的革命和革命中的文学 (1919—1949)

清嘉庆以后,清政府日渐衰微,社会危机四伏。外国资本主义的大炮倒逼中国社会改革。沿海一带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并迅速形成了上海这类非常态繁荣的近代都市。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思潮为晚清文学注入了新的内容,中国文学又一次出现繁荣局面。

这次文学繁荣的独特之处主要在于外国文学的影响,并表现出文学的现代化趋势:一是小说和戏剧的社会地位得以提高,有了与诗歌、散文平等的地位;二是翻译文学的繁荣;三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所提倡的“小说界革命”所引发的小说创作的繁荣和小说价值观取向的转变——反对无目的的娱乐性的创作态度,力图赋予小说某种社会责任和改革诉求;四是话剧的萌芽,其中西方话剧的输入直接为文学革命后话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晚清文学不仅服务于当时的政治斗争,而且在思想内容以至文学形式方面,都为五四新文学的萌生做了必要的准备。

一般认为,我国现当代文学始于1917年。我们以某些标志性的政治事件或者文学事件作为时间节点,将中国现当代文学划分为不同的时期,不同时期的文学呈现出不同

的特征。

一、文学的革命

1917年1月、1918年4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分别发表了题为《文学改良刍议》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文章，提倡白话文，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此后三十多年，中国文学不仅走出了自己的路，而且还几乎囊括了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所有成就，并创造出至今难以企越的高峰。

有理论文章开路，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李大钊等人积极响应，推进了文学革命的发展。“十月革命”的炮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五四运动的爆发，把文学革命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与此同时，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的作家创作的新文学作品，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表明了新文学的实质性进展。在小说方面，有鲁迅划时代的《狂人日记》和后来结集在《呐喊》、《彷徨》中的诸篇小说，还有叶绍钧、冰心、郁达夫等一大批新文学作家创作的内容和形式全新的小说。在诗歌方面，出现了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刘大白等众多的白话新诗人，他们以白话新诗动摇了千百年来旧体格律诗的正宗地位，尤其是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以其内容和艺术的特有气势，开创了自由体白话新诗的一代诗风。散文方面的成就甚至超过了小说和诗歌，它体现在鲁迅、李大钊等人创作的大量文艺短论，还有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许地山等人创作的抒情叙事散文中。此外，瞿秋白创作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等通讯报道，是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的最初萌芽。胡适、洪深、田汉、欧阳予倩等人创作的白话剧本，则在中国首先尝试了话剧这一新文学样式。所有这些创作都以新的题材、新的主题、新的人物形象和新的语言形式，呈现出开创一代文风的崭新气象，充满了破旧立新的五四时代精神。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最突出的主题是反封建。农民及其命运成为许多作品的主人公和素材，而

且与历来文学不同,作家在描写农民的过程中,彻底否定了整个封建旧制度,具有更强大的批判力量。知识分子的生活、探索和思考也得到了广泛的表现,很多作品反映了进步知识分子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高度敏感,描写了他们摆脱封建道德束缚、争取婚恋自主、追求个性解放的奋斗和抗争,同样体现了反封建的思想主题。

1921年以后,随着新文学理论和创作的深入发展,出现了大量文学刊物,涌现出众多的新文学社团,较为重要的有: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新月社,以及未名社、莽原社、南国社等。其中,文学研究会标榜为人生的写实主义,创造社鼓吹重艺术的浪漫主义,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两大风格流派,对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此外,还出现了“问题小说”、“身边小说”、“乡土文学”、“语丝文体”、“象征派”与“现代派”诗歌等丰富多彩的风格和流派,这些社团流派的出现表明了新文学的成熟与壮大。这一时期新文学作家们还通过各种渠道广泛译介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从而扩大了新文学的艺术视野,开创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相联系的格局。

这一时期文学的局限在于,一些作家生活视野还较狭窄,不太熟悉自己以外的天地,崇尚自我和自我表现的情绪成为一时的风尚。有些作品还程度不同地带有感伤颓废情调,甚至有宿命论倾向。在译介外国文学的过程中,有些译者未能很好地区分精华和糟粕,缺乏应有的分析批判能力;而在对待民族文学遗产上存在的某些形而上学、虚无主义倾向,又影响了文学创作更好地实现民族化、大众化的艺术追求。

二、革命中的文学

文学革命的成功风靡,让文学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获得大解放,进入发展的新天地,并进而跳出“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审美王国,积极地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参

与到“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社会革命中。对革命的积极参与,让文学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使命。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8—1937)的文学,通常也称“左联”时期的文学。左翼文学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高涨,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除了出现一批左翼作家的作品之外,还出现了巴金、老舍、沈从文、曹禺等一大批风格独特的作家作品,以及众多的社团流派,形成了现代文学的繁荣局面。因此,它是现代文学发展、成熟的阶段。

1928年前后,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以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为主,开始积极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并得到了广大进步作家的积极响应。20世纪30年代初成立的“左联”等左翼文学团体,把一切运动权力推向高潮,使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潮。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思想性和战斗性显著增强。作品的题材扩大了,很多作家注重正面反映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军事、经济、文化侵略的罪恶,批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都市社会光怪陆离、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作品中反帝、反封建的主题也进一步深化,革命者的形象和底层劳动者特别是农民的形象塑造,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很多作品不仅表现农民的苦难遭遇,而且着力描写农民的思想觉醒和英勇斗争;不仅揭露封建压迫的残酷和阶级矛盾的对立,还注重展示帝国主义势力对农村的入侵和民族矛盾的加剧。这些都表明文学创作达到了新的思想深度。茅盾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子夜》、《林家铺子》、“农村三部曲”等,还有蒋光慈、洪深、田汉、臧克家、丁玲、张天翼、叶紫、洪灵菲,以及“左联”五烈士、“东北作家群”、中国诗歌会等作家和社团的创作,都显示了左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作的辉煌成就。这一时期,左翼之外的一些重要作家也创作出了现代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杰作和—

些探索性、尝试性的作品，特别是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老舍的《骆驼祥子》、曹禺的《雷雨》和《日出》，以及沈从文的《边城》，李劫人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等“大河小说”，还有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诗歌和以施蛰存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等等，这些作品都以不同的艺术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现实社会的矛盾，达到了较深的思想境地，显示了较高的艺术成就。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在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普遍超越了上一时期，但也存在明显的缺陷。由于一些作家对群众的革命斗争生活还缺少实际了解，因而有些作品生活实感较弱，革命者和劳动群众的形象塑造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概念化的弊病，有些人物形象血肉不够丰满，甚至单薄苍白。一些作品虽反映现实较为及时，但缺乏精细的艺术磨炼，略显粗糙，以致影响了作品长久的审美价值。这一时期的文艺工作者们在理论和实践中虽也广泛注意到了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并多次展开过专门讨论，但问题远未解决。

自1938年至1949年，整个中国都处于浓浓的硝烟之中，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此起彼伏，以沧海横流般的架势扭转着国家发展的轨迹，其对文学的影响之巨大，在整个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中也是不容小视的。

这一时期又以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抗战初期的文学，广大作家从书堆中抬首，奔赴如火如荼的革命战争并进行文学创作。围绕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大量通俗明快、短小精悍的文艺作品，如街头诗、独幕剧等，也出现了一些大型的集体创作。这一阶段还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剧，作家们纷纷借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之口，疾呼现实之严峻和不平等。其中，以郭沫若的《屈原》、《虎符》等历史剧最为成功，影响最大。后一阶段的文学分为解放区和国统区两大区域。在解放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方针,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解决了文艺大众化等一系列五四以来重要的文艺理论和实践问题,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阶段。在文学创作中,出现了新文学以来前所未有的新主题、新题材、新形式,涌现出了赵树理、孙犁、丁玲、周立波以及《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等一大批具有典型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作家和作品,代表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在国统区,作家的创作主要围绕反压迫、争民主的民主革命运动展开,出现了大量具有讽刺性、揭露性的作品,如茅盾的《腐蚀》、巴金的《寒夜》、袁水拍的《马凡陀的山歌》、陈白尘的《岁寒图》和《升官图》,等等,作家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体裁,全面而深刻地暴露和批判了国统区的黑暗现实。国统区的很多作家在艺术风格上也努力向民族形式和大众化方向发展,并取得了可喜成绩。此外,沦陷区的张爱玲、钱钟书等人的创作,也以独特的风格,成为近百年文学景象中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显示了极高的思想成就和艺术价值。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是以五四以来的现实生活为土壤的,但也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的或外来文学的丰富营养。它一方面与中国民族文学遗产保持着继承关系,另一方面又汲取了世界文学潮流中的有益成分。现代文学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而且直接以近代文学为先导。广大现代作家身上厚实的古典文学根基,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新文学创作。同时,现代作家又广泛译介了世界各国文学,打通了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道路。现代文学史上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周作人、郁达夫、瞿秋白等,都参与过对外国文学的传播介绍。这种介绍在思想倾向、艺术观念及创作技法上,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中外文学相互交融的历

史,是在交融过程中建立民族新文学的历史。

第二节 “运动”中的文学和文学的不运动

(1949—1976)

如果说五四新文学扎根现实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进行了批判性的吸收而开一代风气之先,那么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文学,则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上进行了迭代创新,走了更远的一段路。但另一方面,“十七年文学”也在政治运动的挟裹下不断远走:意识形态的严重渗透在很大程度上致使这一时期的文学距离文学的审美本性越来越远,甚至沦为政治或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文学地位大有回到魏晋之前的悲戚情势。

一、“运动”中的文学

总的来讲,“十七年文学”创作是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总方向,倡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这一时期的文学生产,同这一时期的物质生产一样,都在“深入贯彻”着政治运动中的领袖精神。

“十七年文学”的小说继承中外文学尤其是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以革命现实主义为主流,在历史和农村现实题材方面取得了比较突出的艺术成就。长篇小说如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曲波的《林海雪原》、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吴强的《红日》、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短篇小说如王愿坚的《党费》和《七根火柴》等,大量优秀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以反映民主革命为主,再现了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浴血奋斗的历史进程,热情歌颂了革命前辈艰苦卓绝的光辉业绩,引导人民理解今天的幸福生活,带有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农村现实题材方面,赵树理的《登记》和《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李准的

《李双双小传》、浩然的《艳阳天》等小说充分表现了中国从“土改”到农业合作化,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到党对农村政策的调整等十七年中农村的一系列变革和农民伦理道德观念与文化心理的巨大变化。

“十七年文学”的诗歌与时代和现实紧密联系,以各种形式如叙事诗、抒情诗、自由诗、格律诗、自然风景诗、历史神话诗、爱情诗、政治讽刺诗等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斗争,热情赞颂祖国的新时代、新生活。李季、郭小川、贺敬之等一批诗人都在从内容到形式的诗歌艺术探索中获得重大的收获,为新诗的民族化、大众化做出了贡献。

“十七年文学”的散文在整体上超过了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的散文创作,为社会主义散文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叶圣陶、冰心、巴金等文坛宿将,徐迟、郭小川、峻青等诗人和小说家,吴伯箫、吴晗、邓拓等教育家和历史学家或党政领导,杨石、郁茹等新人,组成了一支庞大的散文创作队伍,并由此形成一个以杨朔、秦牧、刘白羽等中年作家为骨干的散文作家群,使散文走向繁荣。这一时期的通讯报告、抒情散文、报告文学、杂文等,比其他文学体裁更迅速、更直接地反映了新时代、新生活。同时,散文创作者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的突破,使得“十七年文学”散文园地更增勃勃生机和绚丽色彩。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还有一个独特的收获和文学现象,即史传文学的崛起。大量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革命回忆录纷纷涌现,讴歌无产阶级革命的辉煌历程,但其艺术价值严重欠缺。

“十七年文学”的戏剧创作继承和发扬了解放区戏剧的现实主义传统,成绩较显著。这一时期的戏剧创作题材广泛、品种繁多,有话剧、歌剧、戏曲和改编的传统剧,其中话剧成就最大。如老舍的《龙须沟》和《方珍珠》、曹禺的《明朗的天》、海默的《洞箫横吹》等剧作从多方面迅速反映和表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现实生活,在探索话剧民族化、大众

化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话剧中的历史剧创作,如郭沫若的《蔡文姬》、田汉的《关汉卿》、老舍的《茶馆》、曹禺的《胆剑篇》等有着很高的思想艺术成就,《茶馆》甚至在世界上享有盛名。

二、文学的不运动

虽然,我们不难在“十七年文学”中找到几片高贵的思想和艺术的贝叶,但是,放在这百年来的白话文学史中看,“十七年文学”整体上的贫瘠是显而易见的,甚至是触目惊心的。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文革文学”。

1958年,在经济上展开“大跃进”的同时,毛泽东在文艺上也提出了“大跃进”,这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学走向“文革”的重要一步。在1966年至1976年整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观念和意图更直接地转化为文学作品,作品的接受行为也更明确地被赋予了特定时期的政治意义,而当时作家的写作和作品的发表也需要经过允许。

“文革”期间的文学存在两种不同形态:一是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的作品;二是秘密或半秘密状态写作和传播的作品,通常称为“地下文学”。公开出版的文学创作,基本上遵循着文学激进派所确立的创作原则和方法。“文革”时期的小说、诗歌、戏剧,其艺术经验主要来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但是意义指向确定的“公共”象征,用当代文学研究者洪子诚先生的话说是以“公共”象征取代了生活细节精确刻画 的描述,其重要特征是:政治直接“美学化”。^①

“文革文学”,可以说是“政治唯美主义的巅峰之作”^②,也可以说是文学最直接的政治化。

① 洪子诚.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88.

② 叶世祥. 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

在“文革”时期的小说创作方面，代表作家作品有浩然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作品自觉运用“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来塑造高大光辉的英雄形象，在艺术上也更有力地贯彻了当时倡导的“典型化”的象征手法。无论是作品中人物的个体意义，还是作家的体验本身，都被整合到小说所认同的“文化大革命”统一的历史叙述中。

“文革”期间，戏剧在文艺诸样式中居于中心地位，“样板戏”的创作在此时期被描述为与“旧文艺”决裂的产物，代表作品主要有《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林海雪原》等八个样板戏。“样板戏”本身的意义结构和艺术形态表现为政治乌托邦想象与大众艺术形式之间的结合，而作家、艺术家那种个性化的意义生产者的角色认定和自我想象被破坏和击碎了，文艺生产完全被纳入政治体制之中。

在写作方式上，文学批评最流行的方法是组织写作小组，这反映了文学批评的集体性、非个人性。“文革”前后以姚文元名义发表的一些长篇文章，如《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评“三家村”》等，都由设在上海的写作小组撰写。诗、小说、散文的发表，许多仍是采用个人署名的方式，但是“集体创作”得到鼓励和提倡，尤其是“工农兵”的创作。“文革”期间，国内与外界的文化交流几乎处于完全隔绝的封闭状态，少量的文化交流主要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考虑。

纵观1949年到1976年，“十七年文学”展现了中华民族除旧布新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社会变革风貌，表现了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但是，“左”倾思潮的严重干扰导致这一时期的文学题材领域相对狭窄，人物形象单一片面，艺术风格、艺术形式的发展也受到很大限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严重阻碍了文学的健康发展，导致了文学发展的停滞甚至退步。从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反胡风斗争、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对人文思潮的批判等一系列文学事件看，这一时期所谓的文学运动更像是政治运动。